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位论文选

SHOUDU SHIFAN DAXUE ZHAXUE XUEWEI LUNWENXUAN

(2005—2012)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位论文选

SHOUDU SHIFAN DAXUE ZHEXUE XUEWEI LUNWENXUAN

(2005—2012)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位论文选(2005—2012)/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编.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656-1127-8

I. ①首… II. ①首… III. ①哲学—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0210 号

SHOUDU SHIFAN DAXUE ZHIXUE XUEWEI LUNWENXUAN (2005—2012)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位论文选(2005—2012)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编

责任编辑 王亚利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337 千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总序

如果给哲学以一个意象，那么“水”或许是最自然的选择。无论在最早的希腊哲学家泰利斯那里，还是在很早的中国哲学著作《管子》那里，“水”都被认为是万物的始基或本原。它是印度的“四大”（地、水、火、风）、中国的“五行”（水、火、木、金、土）和希腊的“四元素”（水、火、土、气）之一。水是生命的源泉，生命都是从水中成长起来的。水是文明的源泉，人类所有古老的文明都是在一些大河流域内诞生的。甚且，水是人类借以自我意识的中介，在人类没有发明镜子前，水正是人类从中发现自我形象的自然镜子。哲学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表征，是人类思想和不断再思想的学科。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缘故，水被人们和哲学家们所关注，乃至“水”成为最古老的哲学范畴或最古老的哲学范畴之一。在《圣经·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一章中，神（上帝）创造一切，但却没有创造水。水跟神（上帝）一样地原始。当代科学证明了：地球最宝贵的资源是蔚蓝色的水。假如水资源耗竭殆尽，人类的末日也就真正来临了。换句话说，只要在任何一颗星球上发现了水，就有了生命的前景，也有了智慧和爱的希望……

我们已经步入这样一个时代：通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你我在地球任一位置上，均可即时寻找到对方的位置。现在我告诉你：中国·北京……在我们国家的首都，水资源的匮乏已经给人们带来了深切忧患。但是，在两个湖泊——昆明湖和玉渊潭间，流淌着一条这样的河流，她的名字叫做“昆玉河”。我们在昆玉河畔生活、工作和学习。在喧嚣和骚动的闹市中，有一群人沉思着，迷恋着，像昆玉河一样静静地流淌，默默地流淌……

在现代社会，哲学已经被边缘化。但任何关于“哲学终结”的理论却全都没有实际地“终结哲学”。哲学附着并渗透于人类的生活中。人类具有理性，经常并习惯于思考生活，这就是哲学存在的前提。在哲学所发源的希腊古典时代，人们认定人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生活，认定幸福的生活就是德性的和理性的生活，认定哲学的生活方式就是理性的和德性的生活方式。所谓

德尔斐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和“万勿过度”，正是这个意思。哲学正是这样获得了自由、高贵和光荣。如今，哲学应当回到古典精神中去，首先并且主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哲学既不仅仅是一种学业，谋取学历和学位；也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谋取职务和职称。哲学不是“饭碗”，不是为了“吃饭”所谋求的种种指标体系。而今，献身于哲学事业的人们，尤其应当“在无名中生存”，从权力、金钱和名声的浮躁中解放出来，生活着并且理性地思考着自己的和人类共同的生活。

但是，哲学并不限制于唯一现实的世界，而是开辟了种种可能的世界。哲学是一张比任何地图都更加复杂、更加丰富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你有你的位置，我有我的位置。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位置不仅存在于你我所生活的物质世界中，而且存在于你我所生活的精神世界中。是的，我们正在致力于自我定位的尝试。编选“昆玉河畔·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丛书”的宗旨是：弘扬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学术成就，系统推出具有一定学术知名度和公共影响力的老中青学者学术代表作，推动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学术研究。丛书采用“昆玉河畔”名称，以便提炼特色，打造品牌。入选书目既包括个人学术自选集，也包括集体学术自选集；既包括学者文库，也包括学生文库，以及学科手册等等。我们计划分3批出版，每批共出版10种。这套丛书正像这条河流一样，映照着我们自己的存在。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经历了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发展。第一代学者的治学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史论结合的学风，他们那种敢于直面现实的理论勇气、敢于破除教条的思想锐气，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的时代风气。第二代学者治学，或阐释、或考证、或梳理，其严谨、其细致、其精微，既注意思想资源的开发，又注意当代价值的挖掘，他们这种治学态度，无不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转向的时代风气。近几年来，通过人才的引进、整合和培养，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队伍不断壮大，尤其第三代学者的崛起，必将带来新的前景、新的希望。

当然，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团队依然处于她的幼年时期，许多成果不够成熟，甚至充满稚气。推出这套丛书，等于一次亮相。但是，序曲已经奏响，序幕已经拉开，演出已经开始，我们期待的是理解、热情和公正的批评。

“昆玉河畔·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丛书”编委会

2007年4月25日于北京

目 录

上编 博士学位论文选 (2007—2012)

马克思主义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及基督宗教内在的革命性——解放神学	
产生的原因分析	刘春晓 (3)
精神与境界	高连福 (16)
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研究	陈治国 (25)
出土文献与儒家《易》的经典化新证	崔存明 (33)
索伦鄂温克萨满信仰: 真实与虚幻之间	王 伟 (42)
辩证法的没落和“世界观”的崛起	林国荣 (52)
行 动	陆 丁 (60)

中编 硕士学位论文选 (2005—2012)

陶渊明的性情说	周广友 (73)
马一浮与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关系	李淑敏 (81)
马克思与海德格尔: 科学技术思想的比较	郭洪水 (90)
符号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荣 鑫 (97)
十王堂祭的“现象学”描述	梅剑华 (103)
吴澄“和会朱陆”思想的本体论表现——“理气未始相离”的理气论	
.....	黄义华 (116)
中国传统村规民约的伦理特点	赵大建 (122)
孟子道德生成论之理论评价	朱慧玲 (132)
居士对《俱舍论》的研究	杨 浩 (139)

自由意志视角下的企业道德责任	张 起 (145)
伏羲祭祀与国家刻划	张宏斌 (152)
“好”的界说	戴木茅 (158)
汪公信仰之儒教因素	曾顺岗 (165)
单子论体系的逻辑分析	刘兰军 (172)
戴震与宋明理学——理欲二本与一本	赖尚清 (179)
亚里士多德的方式——《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论证秩序	苏福金 (187)
魂魄观念的发展——魂魄观念与长生不死	丛 伟 (192)
听 众	傅金岳 (198)
真诚与教育	余 露 (204)
宗教信仰以及日常审美：土家族审美观念实践及发展	黎梦茜 (211)

下编 学士学位论文选 (2009—2011)

后天必然命题	高鹏飞 (219)
《福乐智慧》中的人物形象与韩非子的法律体系	祖丽胡玛尔·艾尔肯 (223)
对维特根斯坦批判的两种主要解释	冯 喆 (227)
“道体德用”关系之体现	俞 婕 (232)
哲学视域下“奇门遁甲”的象数义理分析	湛 昇 (237)
意见与理论：自然主义世界观	郭昱辰 (241)

附编 博士后出站报告选 (2010—2012)

陈白沙与明代早期的儒学转向	盛 珂 (247)
身体是必要条件吗？	李 曦 (257)
米塞斯的先验论	黄华侨 (267)
国家观念厚与薄	陈德中 (277)
钱穆“道”论研究	王晓黎 (286)

附录 学位论文一览表

附录 1 博士学位论文一览表 (2007—2012)	(299)
附录 2 硕士学位论文一览表 (2005—2012)	(300)
附录 3 学士学位论文一览表 (2009—2011)	(310)
附 博士后出站报告一览表 (2010—2012)	(312)
编后记	(313)

**上
编**

**博士
学位
论文
选**

(2007—2012)

马克思主义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 及基督宗教内在的革命性^①

——解放神学产生的原因分析

刘春晓

解放神学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对基督教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基督宗教本身内在的革命性因素和拉美特定的环境相结合的产物。

一、马克思主义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从 19 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世界范围的基督教领袖和基督教思想家就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着回应。“与马克思的相遇改变了世界基督教的面貌，这在马克思逝世一个多世纪后是显而易见的。”^②

马克思主义对于基督教世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罗马天主教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的有条件的接受

第一个对马克思有所回应的基督教领袖是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1849 年他颁发了通谕《你们知道及与我们》(“Nostis et Nobiscum”)，称马克思的学说为“邪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谴责它为“有害的虚构”。1864 年又颁发通谕《多么大的操心》(“Quanta Cura”)，再次谴责马克思的学说是“最致命的错误”。^③

19 世纪后半期，伴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和《资本论》的出版，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与日俱增。庇护九世(Pius IX)的继承人利奥十三(Leo XIII)虽然

① 节选自刘春晓著：《“解放神学”之批判》，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2008 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 Denis R. Janz: *World Christianity and Marx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6.

③ 同上。

仍然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对利奥十三产生重要影响的著名德国天主教社会思想家 Wilhelm Emmanuel von Ketteler(1811—1877)一生都没有间断对马克思的研究,甚至去世时,他的手提包中还有一本《资本论》。基于高度的社会自觉和对穷人的责任心, Ketteler 早就开始关注马克思的思想。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认可了资本主义的基本错误,即劳动力只是市场上能够被买卖的商品的假设,但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危机的解决方式即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转移不可能成功。但他同时提出了工会在解决社会危机中的作用。^① 1891年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发表了通谕《新事》(Rerum Novarum),通谕反映了 Ketteler 的社会思想。它谴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阶级斗争学说,提出了天主教的“社会理论”。但是,通谕同时指出了“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下的紧迫问题”,批判了自由资本主义。它明确指出,社会危机产生于“大众的赤贫”和“少数个人巨富”之间的巨大差异,而导致这种不义现实的正是“雇主间无节制的竞争与贪婪”;认为这种社会现实并不比奴隶制度本身强多少;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主张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国家有责任介入从贪婪人的残酷行为中解救不幸的工人。通谕号召国家和独立工会要保护工人等等。^② 因此,尽管《新事》仍然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新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20世纪上半叶,罗马天主教会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持反对态度,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迎来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期,天主教会一向保守的态度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影响也日益缩小,这引起了教会内外的普遍不满,教会的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势下,庇护十二世的继任者约翰二十三世(任期1958—1963年)上任不久就设立了无神论研究院,并决定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年10月—1965年12月罗马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简称梵二会议),会议分为四期:第一期,1962年10月11日—1962年12月8日;第二期,1963年9月29日—1963年12月4日;第三期,1964年9月14日—1964年11月21日;第四期,1965年9月14日—1965年12月8日。会议可谓旷日持久,但主题只有一个,就是“跟上时代”。大会筹备期间设立了非信徒秘书处,专门负责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第一期会上,约翰二十三世颁布了重要通谕《世上和平》,尽管仍然宣布反对暴力、反对革命的理论,但他同时也宣布了要和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一切有良好愿望的人”对话的新策略,梵二会议翻开了当代天主教革新发展的崭新一页。

^① 参见 Denis R. Janz: *World Christianity and Marx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9.

^② 同上书,第19—20页。

与此同时，创建于1955年的保罗会，是天主教神学家与各学科科学家的联合会，致力于信仰与科学的对话。梵二会议后则致力于组织天主教徒与马克思主义者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对话活动。“保罗会于1965、1966、1967年在不同地点连续组织了三次欧洲共产党人与天主教人士的集会，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①

这些做法刺激了基督教徒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和思考，为基督徒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思想家们反思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态度等问题。从对抗到对话，这种态度的转变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是天主教会寻求自身生存、发展和影响的途径，更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对于人类世界历史的巨大影响密不可分。

第二，基督教神学领域：政治神学和解放神学的兴起

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公正现象的揭露以及对于社会现实的强大变革功能促使基督教神学家们更加关注社会问题，也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教牧实践和理论转向。德语神学界最有影响的三位神学家拉加茨(Leonhard Ragaz)、卡尔·巴特(Karl Barth)和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都深受马克思的影响。

拉加茨(1868—1945)是瑞士的一位改革派牧师，在巴塞尔和苏黎世大学开始其学术生涯。他公开表示同情罢工的工人并投身于宗教社会主义运动。早在1903年，在一篇著名的布道文中，拉加茨就提出了两个重要命题。“一，他确信在社会各阶层间的斗争中，基督并不中立：他会坚定地站在被压迫阶层这一边，而社会主义则是这一洞见的逻辑结果。二，他认为社会主义是神的王国的记号。”^②这两个命题成为他日后社会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二战爆发后，德国的一些神学家纷纷为本国的战争行径辩护，这使他认识到不论是教会还是神学都偏离了正路。于是，1921年他主动辞去苏黎世大学神学教授职位，搬出上流住宅区，搬到工人住宅区和工人们生活在一起。1929年，他在《哪种世界观属于社会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现代性被不幸地划分为‘只信仰上帝而否定他在地上的王国’和‘只相信神在地上的王国而否认神自身’，而真正的基督教应是二者的结合，它反对官方教会和各种现存的社会主义形式。”^③

① 任延黎“罗马天主教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对话”(1)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6期。

② Denis R. Janz: *World Christianity and Marx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1.

③ 同上。

拉加茨认为,马克思对于基督教的批判是正确的,近代以来,基督教确实越来越脱离普通大众阶层,也确实把现存的不公正的秩序神圣化,而成为规劝人民忍受压迫的鸦片。“基督教像异教一样,重又使贫困、不公、疾病和死亡成为神圣的世界秩序的组成部分”^①基督教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和奴役的力量。他认为教会已经迷失了方向,马克思主义对它的批判是公正和必要的。这种批判使基督教重新找到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拉加茨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有“20世纪基督教教父”之称的卡尔·巴特(1886—1968)。巴特在政治上毕生倾向于社会主义,早在1911年,作为一位改革派牧师,在一篇题为“耶稣基督和为了社会正义的运动”的演说中,他就大量引用福音书说明社会主义者的愿望正是耶稣基督的愿望,即在地上建立神的王国,而这一愿望的主要障碍就是资本主义。1916年巴特更直接地指出:“真正的基督徒必须成为社会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是基督徒。”与拉加茨相同,巴特认为,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击中了基督教的要害,并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健康的矫正方法。他说:“难道教会没有由于其关于灵魂和肉体的教义而至少表现出对于物质、生命以至当代经济状况的应受谴责的冷漠吗?难道它没有用对‘耶稣死而复活’的宣告制造一种灵魂不灭的教义吗?神的审判和允诺是环绕整个人类的,因此,撇开物质和经济上的现实,神的公义就不能得到确证和相信;或者被作为与物质和经济现实相对的意识形态加以否定或被搁置一旁?”^②总之,巴特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提醒着教会和神学研究没有注意的问题。”^③

保罗·蒂利希(1886—1965)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路德教会的随军牧师,在战争中转变成社会主义者的。尽管他拒绝接受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各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深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一文中,他指出:严肃的基督教神学不可能绝对拒绝接受马克思的思想。

蒂利希认为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基本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和基督宗教都体现了一种末世论情绪、一种对于正义最终胜利的向往、一种面向未来的期待,二者都指出了个人在历史发展过程的主体作用。二者的第二个相似之点在于“结构上的类似”,即在于它们的人类学、它们对

① [瑞士]拉加茨著,朱雁冰译:《上帝国的信息》,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② Denis R. Janz: *World Christianity and Marx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6.

③ 同上书,第24页。

于人性的观点。二者都认为人类的实存状态并不是其所应是的状态，马克思主义者把这种状态描述为人对自身的疏离，和由此导致的非人化，人成为物和获取利益的手段。而基督徒则称之为丧失上帝形象，人与自身的神圣目的、与人类伙伴间的疏离。二者都看到了人类的“堕落”、看到了人类与自身理想状态的距离；看到了实际历史存在的歪曲状态。

蒂利希还论及了马克思的其他“发现”，比如：马克思对“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要求”、对物质生产是“全部历史过程的基础”的强调；马克思理解历史运动的辩证方法，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揭露等等。蒂利希认为这些发现对基督教神学具有持久意义，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拯救了基督教的“末世论”思想。蒂利希认为，在马克思之前，基督教的末世论思想只剩下了“个人在死后才进入的静止天堂”的狭隘意义，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使基督徒可以把神的王国理解为“处于历史之中和之上的驱使历史向终极目标发展的动力。”^①总之，蒂利希认为，马克思以各种方式矫正了基督教思想。

在法国，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无不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利坦就不会建立起他的神学人本学；人格主义者伊曼纽尔·穆尼埃则公开表示要向马克思主义表示敬意，他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社会与经济现实作出了最深刻的理解，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关于人类历史的观点之间有着广泛的相似性。他说：“具有共同的历史和命运的、没有一个个体的命运可以与之相分离的人类这一概念是教会的至高无上的思想之一，它的世俗形式是18世纪世界主义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富有生命力的原则。”^②尽管穆尼埃是从基督教的角度理解“作为具有共同的历史和命运的人类”这一范畴，但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才使穆尼埃认识到了人类这个范畴所具有的内涵，即个体与类之间命运的紧密相连性及其共同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主义同样影响到英美基督教思想界，当代英美影响较大的神学家都深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美国最具影响的两位神学家H·理查德·尼布尔、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两兄弟、著名的美籍英裔社会伦理学家A·麦金泰尔都深受马克思的影响，并称自己是基督教马克思主义者。从神学思想界来看，马克思主义对于基督教世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使基督教走出了纯粹的灵

① Denis R. Janz: *World Christianity and Marx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6.

② [美]罗伯特·戈尔曼著，赵培杰，李菱，邓玉庄译：《“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词典》，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1页。

修转向社会生活领域，并由此导致对于《圣经》中社会层面之言述的新的解读。使神学在发展中强化了其社会和政治关切的维度，“许多神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形而上学的空谈和对神学内在逻辑的抽象思辨，开始从社会结构和制度以及敏感、迫切的社会政治问题出发来展开其神学构思，从而出现了神学与社会学及政治学密切结合的局面。”^①

总之，19世纪中叶以来，罗马天主教教会和基督教神学界所关切的问题和神学构思和发展都发生了很大转向，这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密不可分的。尽管国内学术界对此极少论及，但这是许多基督教神学家和思想家自己认可的。20世纪20年代以来“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影响，包括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和布洛赫的“希望哲学”直接催生了欧洲的政治神学和拉美的解放神学。

二、基督宗教内在的革命性因素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于宗教的论述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但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论述却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片面强调了宗教的鸦片功能。实际上，马克思在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同时，还强调了“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和“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因此，宗教中既包含有“鸦片”的因素，也包含有革命的因素，从抗议出发必然要求对现实的变革，消除现实社会中的苦难。

第一，基督宗教的革命性体现在它的诞生标志着宗教信仰的一次精神革命。

基督教诞生之初，耶稣就针对当时犹太人信仰的混乱，强调他的到来首先是为了纯洁信仰。平民出身的耶稣能够终其一生沉着而勇敢地直接面对和挑战来自旧宗教的权威和世俗的势力，他公开违背安息日的律法，公开对有些律法提出质疑，这种勇气从何而来？美国宗教哲学家约翰·希克认为：从宗教心理学的观点看，只有极为强烈的上帝意识才能维持耶稣那坚定的先知式的自信和超凡能力。对耶稣而言，上帝是支配一切的活生生的实在，他自己就生活在与这一实在的关联之中，当耶稣宣称上帝仁慈却要求苛严的爱和上帝对伪善的审判时，当他宣称上帝宽恕罪人时，他是出于对一种仁爱、明断、宽厚仁慈的超自然临在的直接意识而说的，所以他的话具有一种强烈的

^① 卓新平著：《当代西方新教神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9页。

真实感。许多人的生命都在与他的相遇中被彻底转变。^①

耶稣一生宣讲的主题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即基督教所说的末日的来临，基督教肯定一个末日的到来，认为耶稣基督会在末日对所有存在的人进行审判并决定人的永生或永死。因此，基督教主张人活在世要追随耶稣基督，认清自身的“罪”，悔而改之，信仰福音；福音的核心即认信基督耶稣用自己的生命之血赎清了所有人的罪，使人从罪里得到释放，自此不再活在“罪”里面，而是活在“爱”里面，“爱就是爱人如己”，活在爱里面即可享有永恒的生命。这里的末世审判涉及的是个人生活领域，由于认罪与悔改，信仰主体就成为一个“爱”的主体，对世界和他人的爱就会自然“流出”。然而，爱不是无原则的绝对顺从，而是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博爱。是对自我缺陷的认清与革除，也是对世界缺失的认识与谴责。因此“悔改，信福音”既是与活在“罪”里面的旧我的告别，也是新生命的开始，悔改的意义就在于过一种全新的生活，这也是新约的意义所在。耶稣反复强调新约是神与人在“里面”的约定，“里面的约定”既是信仰主体对“律法”的自觉、又是对律法的超越，这种超越是一种精神上的革命，它代表着宗教发展的新阶段，即“行将成为人类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的阶段”。^② 借着“爱的约定”和耶稣的一次性赎罪，“一切时代的、一切人的罪，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自愿牺牲而永远被赦免。于是，以后就没有必要再作任何牺牲，许许多多的宗教礼仪也就随之而失去依据。”^③早期基督教就这样结束了旧宗教的献祭时代，它用内心的祈祷代替了外在的烦琐的仪式，实现了信仰的精神革命。

“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还意味着现行秩序的行将结束。之所以“当悔改、信福音”，就是因为“天国近了”，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逃脱上帝的末日审判。这在当时无疑是对罗马统治行将灭亡的宣告，罗马当局当然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危险分子的存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他对“天国近了”的宣告。这里，末日审判涉及的是社会生活领域。耶稣否定现实社会中一切的不义，他一再斥责统治者和富人对被压迫者的不义行为，而对穷人、弱者则表现了深切同情，并宣告他们必成为“在先的”。俄国思想家别

① [美]约翰·希克著，王志成，思竹译：《上帝道成肉身的隐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② 《恩格斯论宗教》，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③ 同上书，第30页。